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 布哈林论稿

郑异凡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

# 决定苏联命运的一场斗争

——布哈林和斯大林的争论  
(1928—1929)

---

1928 —1929年联共(布)党内爆发了一场严重的党内斗争,这场斗争后来又发展为一场严重的党内斗争,即所谓“反右倾”斗争。这是十月革命后继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争论之后又一场决定苏联以后发展命运的斗争,也是联共党内最后一场争论,此后在联共党史上可以说再没有“党内争论”这个词了。这两场争论的主角之一都是布哈林,不过他所扮演的角色已经转换,在布列斯特争论中,布哈林站在列宁正确主张的对立面,如果布哈林那时的主张取得胜利,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就有沦丧的危险。10年之后在新的一轮争论中,布哈林已是列宁主义的坚决维护者,可惜这一次他失败了,伴随他的失败的是列宁新经济政策的中止,斯大林模式的确立,从此苏联走上了另一条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不错,这也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但是一条代价惨重的道路,曲折崎岖的道路,今日苏联解体可以说是它的最大后遗症。

## 粮食收购危机和斯大林的西伯利亚方式

1927 年底 1928 年初苏联发生了严重的粮食收购危机。

1926 年底苏联收购了 4.28 亿普特粮食,而 1927 年底才收购了 3 亿普特,缺额达 1.28 亿普特。粮食收购危机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各部门,使工人、红军、城市居民以及经济作物区的农民面临粮食供应困难,也严重影响到国家的粮食出口。为解决收购问题,联共(布)中央 1927 年 12 月 14 日、24 日和 1928 年 1 月 6 日接连发出 3 个指令,要求加紧收购工作,完成收购任务。

1928 年 1 月 5 日政治局成立了由斯大林领导的中央委员会的特别委员会,负责领导粮食收购工作。1 月 6 日中央发布了由该委员会起草、斯大林签署的《中央就粮食收购问题给各地党组织的指令》。指令指出,中央曾于 12 月 14 日、24 日发出指令,责成在粮食收购工作上有一个坚决转变,但时过 3 周,仍无任何变化。地方组织的工作速度不能容忍的缓慢、毫无作为的状态在继续,基层机关尚无动作,合作社未履行其起码职责,政权机关和党的杠杆尚未启动。工业品未被用来为粮食收购服务。农民共产党员、苏维埃和合作社积极分子没有出售自己的余粮,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也没有提供全部商品粮,并且还出现把粮食卖给私商的事情。农民尚未交纳农业税和农业信贷的紧急贷款。“这一切证明党、苏维埃和合作社机关工作松懈以及对农业影响薄弱”。为此中央提出一系列措施,责成各地组织贯彻实施,坚决要求各省(边区)完成商业人民委员部下达的年度和月份任务,“商业部的一切指令均应毫不拖延地予以执行”。商

业部关于装运粮食的安排必须严格地准确准时执行。在回收欠交税款时立即采取各种严厉惩罚措施,首先是对富农,对富农和破坏农产品价格的投机分子必须采取特殊的镇压措施。指令要求各级领导人对完成收购任务承担个人责任,“拖延执行本指令,在本周内粮食收购工作坚决转变上未做出实际成绩,将迫使中央面对撤换党组织现任领导人的必要性问题”。<sup>①</sup>

这份指令尽管谈到要对富农采取严厉措施,但在分析粮食收购困难的原因时仍认为关键在于各级组织工作不力。

1月9日政治局决定派奥尔忠尼启则去西伯利亚,但奥因病于12日取消此行。

1月15日斯大林秘密赴西伯利亚,先后视察了西伯利亚、巴尔瑙尔、卢布佐夫斯克、鄂木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最后又回到鄂木斯克。这是斯大林最后一次到外地基层视察,在视察过程中作出了影响深远的重要决策,产生了所谓“西伯利亚方式”。

就在斯大林成行之日,1月14日发出了《中央就加强粮食收购措施给地方党组织的电报》。电报继续上述指令的精神,认为“已经证明,收购工作中三分之二的错误属领导的失误”。同时也指出,私商和富农利用我们组织的宽宏大量和行动迟缓,破坏粮食市场,提高价格,使农民产生等待观望情绪。电报要求打击投机分子和富农,逮捕他们以及其他瓦解市场和破坏价格政策者。鉴于道路泥泞的停运时期即将到来,南方地区收购工作只剩下一个半月到两个月时间,乌拉尔和西伯利亚也只剩下两个半月至3个月时间,电报认为,“如果不对政权和党的杠杆施加压力,那么我们的整个经济工作全年都会受到抑制”。粮食收

<sup>①</sup> 见《苏共中央通报》1991年第5期第193—195页。

购是我们无论如何都应攻下的堡垒，“如果我们按布尔什维克的方式工作，施加布尔什维克的压力，那我们一定能攻下它”。斯大林的西伯利亚之行就是去“施加布尔什维克的压力”的！

1月18日斯大林出席了联共（布）西伯利亚边疆区区委常务局及粮食收购组织、其他组织代表会议，会议纪要第一次提出运用刑法典第107条于粮食收购工作。

此前，1月17日边疆区常委会曾决定，各基层粮食收购区把几名（4—10名）有粮食而利用粮食困难投机、哄抬价格、囤积粮食的富农作为恶劣的投机分子没收粮食。18日的会议纪要则进一步明确：“作为此决定的补充，认为有必要以检察机关的名义执行上述措施（按照刑法典第107条的程序）”。<sup>①</sup>同时责成边疆区检察机关在报纸和专门布告中发表关于第107条和105条及其实施程序和条件的通告。

所谓105条和107条是指俄罗斯联邦刑法典有关条文。其内容如下：

“第105条。破坏调节商业的条例……处以1年以下强迫劳动或2000卢布以下的罚款。合作或信贷机构管理机关的人员犯有为法律或机关条例所禁止的行为者，处以6个月以下的强迫劳动或500卢布以下的罚款。”

“第107条。通过采购、藏匿商品或不投放市场等手段蓄意抬高商品价格者，处以1年以下剥夺自由并没收全部或部分财产，或剥夺自由。”

上述行为如查明有同商人勾结者，处以剥夺自由3年以下并没收部分财产。”<sup>②</sup>

① 《苏共中央通报》1991年第5期第197页。

② 《苏共中央通报》1991年第5期第197页。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这是用来对付在流通领域利用商品进行囤积居奇、投机倒把行为的，并不涉及自家生产的产品，哪怕是富农生产的产品。但此令一出，凡拒绝按国家牌价出售余粮者，不管是富农还是中农，就统统按 105、107 条论处。这种做法本身就是违法的。

斯大林 1 月 19 日从西伯利亚给中央的密电中指明了这两条的打击对象：1、根据第 107 条打击投机者及富农—收购者，他们是革命法制的破坏者。2、按第 105 条打击基层机关中纵容投机者及帮凶，他们是苏维埃法律的破坏者。<sup>①</sup>

对这种做法在讨论时就有人表示异议。1 月 19 日西伯利亚农业银行理事会主席 С. И. 扎古缅内在会上提出了不同意见并于次日(19 日)写信给斯大林和瑟尔佐夫，表示反对对富农全面实施第 107 条，认为不能仅仅因为不把粮食投放市场就运用第 107 条惩处。<sup>②</sup>

另一项重大措施是 1 月 10 日在西伯利亚边疆区区委下成立“非常粮食小组”，由谢·伊·瑟尔佐夫、Р. И. 爱赫、А. Н. 兹洛宾 3 人组成，这是一个在边疆区拥有全权的特殊机构。此后全国各地纷纷仿效，成立此类享有特别全权的三人小组。

在中央领导人视察期间有大量的地方工作人员因“态度软弱”、“调和情绪”、同富农“勾结”而被撤职查办，开除出党。在莫洛托夫视察的乌拉尔地区，从 1928 年 1 月至 3 月有 1157 名边疆区、区和村机关的工作人员被撤职。

与此同时，开始关闭市场，挨户搜查，把拥有存粮者送交法庭。而法庭则没收一切粮食，不仅储存的商品粮，还有生产和消

① 《苏共中央通报》1991 年第 5 期第 202 页。

② 《苏共中央通报》1991 年第 5 期第 200 页。

费所必须的粮食，往往连农具也没收。对农民实行体刑、打耳光，等等。最后还动用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 58 条第 10 款有关反革命鼓动的条文去对付敢于口头谴责暴力的人。

在斯大林施加的“布尔什维克的压力”下，粮食收购进度大大加快。据斯大林本人给中央的密码电报报告，北高加索过去每 5 天共收购 50—60 万普特粮食，现上升为 100—150 万。俄罗斯中部 4 省过去为 60—70 万，现为 150 万。

斯大林在 1 月 27 日给中央的电报说，决定每昼夜给中央运送 360 车皮的粮食，每月约 1100 万普特。<sup>①</sup> 而 1 月 29 日的电报中这个数字又迅速提高，实际运送数 1 月 26 日为 367 车皮，27 日为 423 车皮，28 日达 433 车皮。决定 2 月份还往西线运送 1240 万普特，即每昼夜 424 车皮。2 月 2 日的电报把 2 月份收购数提高到 1800 万，2 月 4 日又改为 2200 万。<sup>②</sup> 在这一天的电报里他“祝贺中央委员会在 1 月份取得 8000 万普特的成绩”，欢呼“这是党的决定的巨大胜利”。<sup>③</sup> 斯大林胜利地完成了他的西伯利亚之行，于 2 月 2 日动身返回莫斯科，可能在 5 日回到莫斯科。<sup>④</sup>

斯大林的西伯利亚之行不只是解决一个粮食收购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改变粮食收购政策问题，而且也是农业发展或农村发展道路的一个根本性转折的开端。

正是在这次视察中，斯大林首次明确提出发展“大型的集体经济”，即发展集体农庄的问题。最有代表性的是他在联共（布）

① 《苏共中央通报》1991 年第 6 期第 214 页。

② 《苏共中央通报》1991 年第 7 期第 178—179 页。

③ 《苏共中央通报》1991 年第 7 期第 179 页。

④ 2 月 4 日斯大林还从卡梅什洛夫车站给中央发电报。

西伯利亚边疆区委常委会秘密会议上的讲话，其简要记录即系18年后才发表在《斯大林全集》第11卷上的《论粮食收购和农业发展的前途（1928年1月在西伯利亚各地区的讲话节录）》。

斯大林指出革命前俄国约有150万个体农户，而现在达250万。这意味着地主破产了，大经济被摧毁了，农户的耕地增加了。如果农业继续沿这条道路发展下去，那么每过10年就得重分一次地。斯大林认为，“农业的继续发展可以有两条道路：或者发展大型的个体经济，或者是发展大型的集体经济。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sup>①</sup>苏联的中农同德国的不一样，是小农，他们很少使用机器，而贫农则是更小的小农，他们必须沿着扩大经济的路线发展，“沿着逐步把小农和小小农联合成大型的集体经济的路线发展农业”，并且现在就应采取认真的步骤，应当着手干起来。斯大林指出，“当然，在一年，甚至几年内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但必须采取这一方针。<sup>②</sup>

斯大林为集体农庄辩护。他指出，集体农庄在我们这里还不多，它们有点被忽视，被认为不是农业中的大道。有人认为，集体农庄是一回事，而集体形式则是另一回事。集体农庄不是合作成分的组成部分。他给集体农庄下了这样一个定义：

“什么是集体农庄？集体农庄是个体农户按照生产路线组成的生产联合体——不是按销售路线，如消费合作社那样，也不是按供应路线，如农业合作社那样，而是按直接的生产路线。这是三种，甚至四种形式的合作社：信贷、供应、销售和生产合作社。集体农庄是一种生产合作社，正因为如此，集体农庄是合作制成分的一种。不应把集体农庄同合作社对立起来，相反地，应

<sup>①</sup> 《苏共中央通报》1991年第6期第204页。

<sup>②</sup> 《苏共中央通报》1991年第6期第205页。

当善于在合作制中发现集体农庄。”<sup>①</sup>

斯大林的这些观点，在首次发表在《斯大林全集》上的《论粮食收购和农业发展的前途》中就变得更理论化了，在这个很可能以后作了进一步加工的“简要记录”中指出，“目前苏维埃制度是建立在两种不同的基础上：联合的社会主义化的工业和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小农经济”。苏维埃制度是不能长久地建立在这两种不同基础之上的。因此：一、“必须逐步而又坚定不移地把出产商品最少的个体农民经济联合为出产商品最多的集体经济，联合成为集体农庄”。二、“必须使我国各地区毫无例外地都布满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sup>②</sup>

把建立集体农庄提到首位，这是以前党的决议，包括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议所未见的，是斯大林的创造。这标志着苏联农业组织形式的一个根本性转折。

十五大的决议中有关部分是这样说的：

“必须把分散的农民经济在农民进一步合作化的基础上逐步转上大生产的轨道（在农业的集约化和机械化的基础上集体耕种土地）看作首要的任务，大力扶持和鼓励社会化的农业劳动的幼芽。”

“历年的经验，特别是近几年的经验，完全证实了列宁合作社计划的正确性。”

“必须指出，一般合作社，特别是农业合作社，除了有巨大的经济意义之外，它们还是在经济上大规模地联合农民并发挥农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最好形式，是在经济、文化和政治上改造农民并把农民纳入总的社会主义建设轨道的最好形式。”

<sup>①</sup> 《苏共中央通报》1991年第6期第207页。

<sup>②</sup>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7页。

“反对派的特点就在于他们不相信能够通过合作社把基本农民群众纳入社会主义建设轨道。这就是否定列宁的合作社计划，因此也就是直接背叛了列宁主义。”<sup>①</sup>

决议提到了“把个体小农经济联合并改造为大规模集体经济这一任务应该作为党在农村中的基本任务”，但认为这必须通过合作社这种形式逐步地、自愿地从供销领域扩展到生产领域。决议并没有把集体化和集体农庄提到首位，更没有提出让集体农庄布满全国的任务。

这一根本性的改动是斯大林在巡视西伯利亚时作出、然后用电报形式通知中央的。

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实行非常措施和集体化在1928年初是联共（布）中央一致决定的，布哈林是赞同的。但是迄今为止我们没有看到联共（布）中央当时就这一问题作出的正式决定。恐怕最多只能说，当时在莫斯科的中央委员或政治局委员，包括布哈林在内，没有人对斯大林的新提法、新决定表示过反对。

可以说，西伯利亚之行也开创了斯大林的新的工作方式——先斩后奏，先由个人作出决定并付诸实施，然后由中央追认。此后随着各种反对派被打倒，斯大林一统天下的形成，这种工作作风遂成为一种惯例和制度。

## 非常措施引起的分歧

非常措施的施行立即在两方面引起强烈的反应：首先是农民，特别是中农的强烈不满；其次是比较了解下情的地方干部的

---

<sup>①</sup>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人民出版社版第3分册第360、402—403页。

反对。

西伯利亚农业银行理事会主席 С. И. 扎古缅内在 1 月 18 日的会上就对实行非常措施提出异议,认为这种做法不会为基本农民群众所理解。次日又写信给斯大林,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不能仅仅因为不把粮食投放市场就对富农采取此类措施。富农的剥削不在商业方面,而在农产品的生产方面。在整个新经济政策时期对富农都没有采取过这种措施,而是采取旨在限制其增长的经济影响的手段。采用非常措施不会被基本农民群众所理解,而只会被看作同新经济政策不符的法律。他写道:“也许我错了,但我深信,中农和贫农基本群众会把只因富农不出售粮食而把他送交法庭看作是在某种形式下回到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回到余粮收集制时期”。他强调,“根本问题在于,仅仅因‘不投放’粮食而惩处富农会使中农相信,迟早会轮到他们身上,他们也存有一定数量的余粮”。他认为应当打击收购粮食的富农,在目前情况下,10 户富农就有 1—2 户从事此行当。他建议,对富农采取第 107 条措施时“要极端谨慎”。

斯大林在 1 月 20 日的会上反驳扎古缅内信中所说的富农的剥削实质不在商业而在生产方面,认为“这当然是错的,因为私人生产者搞生产不是为了生产,而是为了出售”<sup>①</sup>。斯大林就此作了这样的概括:“个体经济不是为自己生产,而是为出售生产,否则他们就不会得到任何好处。”<sup>②</sup>斯大林的这一结论是不确切的,个体经济,特别是像中农这样的个体经济,首先是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生产,如果还有剩余才会出售。把全部个体经济都看作为出售而生产,这是为扩大第 107 条的适用范围而制

① 《苏共中央通报》1991 年第 5 期第 207 页。

② 《苏共中央通报》1991 年第 5 期第 209 页。

造的理论,是为强制中农交出余粮而寻找的借口。果然,斯大林接着就说,一部分人,一部分中农将会叨叨,请看一个人在劳动,却不让他随意出售,“他们将感到委屈——我们把他们当作不把自己的商品投放市场的人,甚至当作收购者而揍了他们。我前天说过,中农会说,我用自己的钱购买粮食,如果你想要,你也买好了。显然应该执行谁也不得罪的政策,但从来也没有这种政策。我们不能这样处理富农而不得罪中农。这种政策是没有的,一部分中农将会感到委屈。中农会懂得,这是新经济政策中的转折。”<sup>①</sup>

从斯大林的这段话可以看出,在实行非常措施及以后全盘集体化中侵犯中农利益的种种做法不是一般的过火,而是一种有意制定的政策,而“新经济政策中的转折”一语则透露了斯大林早已心存取消新经济政策之意。

实行非常措施引起广大干部和各阶层农民的强烈不满。

1928年1月联共(布)“第199—202号磨坊”支部书记B.库兹涅佐夫向卡缅斯克区委书记报告农民的情绪说,农民都抱怨今年的赋税太重,这种征税伤了中农和贫农。完不成任务的农民往往被关在冰冷的仓库里。红雅尔村的一个农民无力纳税,就没收了她的几匹马和1头奶牛,结果第二天早上发现他已上吊身亡。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不愿多种,有的农民说,多种了,又从我这里拿走,对我有什么好处,只有为自己播种,税额减少,我才播种。<sup>②</sup>

1928年2月10日国家政治保卫局西伯利亚边疆区分局有一个综合报告《农村党员和共青团员对实行粮食收购措施的态度》。

<sup>①</sup> 《苏共中央通报》1991年第5期第207—210页。

<sup>②</sup> 《苏共中央通报》1991年第6期第215—216页。

度》，其中谈到许多普通党员对强硬措施持否定的态度。党员和农民一起诉苦，说“现在的税收吃不消”，“当局的压力在扼杀农民”，“为什么这个国家不考虑农民的状况？”等等。报告说，“在某些地区他们不是协助工作，而是进行公然反革命鼓动”。

一个村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斯杰潘诺夫收到粮食收购的指令后说：“这是头脑发昏，这一切难道可以贯彻执行？为什么要一下子这么厉害地压榨所有的人？大概党有什么东西瞒着我们。反对派是对的，因为中央的这种政策导致了危机。”此人因此而被撤职。还有一个支部书记也说：“不管关于反对派叫喊得多么厉害，我们执行的还是加米涅夫的政策，但这样能有好结果没有，我怀疑。”<sup>①</sup>

党员戈洛瓦诺夫在党的秘密会上说：“现在党在粮食收购方面的问题提得太突然了，这会造不良后果，因为农民对压榨感到愤慨。如果我们现在到各村去并用各种收费如农业税、保险金、贷款、股金等等去压榨农民，那就是我们改变了以前发布的法令和决定。依我看，这像是军事共产主义，甚至还要坏，因为在和平环境下农民是不会接受这种急剧的转变的。现在不是20年代，因此党和苏维埃政权会在居民面前损害自己的威望，事情会发展成公开的暴乱。”

农民在谈论公开反抗。一个村苏维埃主席、贫农、共青团员说：“在十月革命10周年之际共产党人疯了或正在发疯。不能靠收税去建设。去年也收税，但不像现在这样靠大棒去收。把最后一头奶牛或一匹马以极低的价格出售，这有什么用？难道这样做能发展经济？看来农民只得像1919—1920年那样锻造长矛来保卫自己了。完全是在抢劫，要股金，要收税，要保险金，

<sup>①</sup> 《苏共中央通报》1991年第6期第181页。

并且都要马上交纳，而又不供给商品。”另一个贫农说：“这种压榨有 1920 年的气味，因此看来只好去打长矛了……”<sup>①</sup>

在西伯利亚 1928 年初因对粮食政策不满而发生的农民闹事达 13 次，每起参加的人数从 15 人至 300 人不等，其中有 11 次是由于粮食困难引起的。1928 年 1—6 月国家政治保卫局机关记录在案的在边疆区散发的反苏维埃传单有 76 份。恐怖活动日益增多，1927 年 4—12 月共发生 159 起恐怖事件，而 1928 年 1—6 月半年间就发生 252 起。<sup>②</sup>

1928 年 3 月 26 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阿·谢·基谢廖夫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俄共党团会议上的报告谈到了当时农村的状况：“采取了使我们完全破坏农民情绪的强制措施和行政压制手段……”“由于拿走了农民的粮食，最近农村中反苏情绪剧增。如果仅仅拿走富农的粮食，那还没有什么，然而，还拿走了中农和贫农的……”“在北高加索成立了若干三人小组以加强粮食收购……由于三人小组有逮捕权，所以它们就逮捕了没有完成指令的农民……在巴泰斯克专区有这样的事例：那里强迫运出用来养活全家和播种用的剩余粮食。在叶卡捷琳娜站，没收了一个农民自己买来的家庭用品。在沃罗涅日省一批被关押者写道，它们中间许多人已没留下可用来播种的粮食了，有些人被没收的粮食多于他们所拥有的，因此只好付钱，‘春天来临，已到播种季节，我们却被关押受苦’。他们要求释放”。

基谢廖夫指出，“对待播种运动的情绪很糟糕，农村出现减少播种面积的情绪（‘为自己播种’）”。“农民议论说，难道我们

① 《苏共中央通报》1991 年第 7 期第 179—182 页。

② 《苏共历史问题》1991 年第 1 期第 79 页。

回到了军事共产主义……缺乏进一步发展自己的经济的稳定基础的信心……他们要求政府说明今后怎么办。我们认为做得过火了，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经济不可能运行”。<sup>①</sup>

西伯利亚方式在短时期内在粮食收购工作上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与此同时也使农村局势趋于紧张。广大农民不满，播种面积锐减，农村局势动荡。各地谣传要取消新经济政策，恢复余粮收集制，回到军事共产主义。

1928年4月6日至11日联共（布）中央和中央监委召开联席全会，讨论粮食收购问题。会上通过了《关于本年度的粮食收购和组织1928—1929年度的粮食收购运动》的决议。

关于四月全会的情况我们不很清楚，然而会后斯大林和布哈林分别向地方组织传达会议精神的报告，充分说明党内在粮食危机和解决危机的办法上存在分歧。

4月13日斯大林在党的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作了关于四月全会的工作的报告。报告认为，“本年度我国的商品粮食不比上年度少而比上年度多”，然而却出现严重的粮食收购危机。问题就在于经过连续3年的丰收，富农成长起来了，整个农村，特别是富农，都积下了粮食，富农有操纵粮价的可能了，并且这些富农还得到城市投机倒把分子的支持。这样富农有可能利用我们建设中的困难来投机，抬高粮价。斯大林由此得出结论：收购危机是农村资本主义分子“对苏维埃政权发动的严重进攻”。因此，解决粮食问题必须抓农村的阶级斗争，向富农进攻。

同一天，布哈林在列宁格勒向积极分子作了四月全会的总结报告，对收购危机作了另一种分析。

布哈林认为，在分析困难的原因时，应当既看到阶级斗争，

<sup>①</sup> 《文件作证》，莫斯科1989年版第22—23页。

也看到市场关系和经济比例，“各阶级通过经济形式，通过市场，通过商品量，通过对这些商品量的调节，通过对这些商品量的占有，通过生产关系以及通过市场关系展开斗争”。<sup>①</sup> 不能把经济和阶级两者割裂开来。布哈林认为之所以出现危机，是经济领导机关的失算造成经济比例失调，从而为阶级敌人提供了可乘之机。粮食收购危机首先是由不正确的价格政策造成的，其中之一是谷物同畜产品、经济作物的比价悬殊。其情况有如下表。

1924—1928 年农产品价格指数<sup>②</sup>

（一战前价格为 100）

年 度	谷 物	畜产品和经济作物
1924—1925	129	135
1925—1926	123	140
1926—1927	106	145
1927—1928	109	151

可以看出，谷物的价格逐年下降，而经济作物及畜产品的价格则不断上涨，在农业内部价格的剪刀差不断扩大，如布哈林所说，“粮食在农民可能出卖的一切物品中成为最无利可图的东西了”。<sup>③</sup> 这样，农民宁可把粮食留下用来饲养牲畜，用牲畜及其他经济作物换钱去交纳税款和购买工业品。

其次，税收不利于谷物，大田作物在农民的纯收入中占

① 《布哈林文选》，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中册第 211 页。

② 同上书，第 216 页。

③ 同上书，第 216 页。

39.5%，但在赋税中所占的份额却达 66.59%，而非农业收入（其中包括富农经济的非劳动收入）占纯收入的 27.8%，但在赋税中所占的份额仅为 5.2%。

第三，工业品供应不足。农民在秋收后出卖农产品获得一定量的货币，但国家不能及时投放足够的工业品来满足农民的需要。而货币还没有成为积累的手段。这也影响农民生产和销售的积极性。

这些情况造成的基本市场比例的破坏，使农民不愿种植谷物，也使手里有粮食的农民不愿出售粮食。顺便指出，手里有粮食的不仅仅是富农，斯大林也承认，“持有大部分粮食的主要和基本的群众是中农”。<sup>①</sup>

因此，布哈林认为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继续实行非常措施，而是增加工业品的产量，提高基建投资的利用率，调整政策，使谷物同经济作物、畜产品之间保持比较正确的比例关系，以平衡经济的诸基本因素。

布哈林特别强调两点：第一，“新经济政策无论如何不应当取消”，“新经济政策本身包含着自我克服的根源，即社会主义胜利的根源”；第二，必须看到非常措施的“过渡的、有条件的性质”，随着本年度粮食收购运动困难的排除，非常措施也应该废除。<sup>②</sup>

布哈林的分析是比较符合四月全会决议的精神的。

粮食收购危机实质上是经过数年新经济政策的实践和教育，懂得文明经营和经商的农民对于封闭的行政命令的价格、税收管理体制的一种抗议和反抗。

① 《斯大林全集》第 11 卷第 37 页。

② 《布哈林文选》中册第 224、226、230 页。